

# 帝國主義 文學生產



europa & affrica

Orlans

M A R

ASIA

Sem

Mare magnum siue

EVROPA

Lefeb

mediter  
rhenum

AFRICA

Cham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李有成 主編

# 帝國主義與 文學生產

主 編  
李 有 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一九九七年

# 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

---

© 本書版權屬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發行人／許嘉猷

主編／李有成

助理編輯／葉長青

校對／陳雪美・盧德瑤・陳薇萍・徐秀儀・蔡佩庭

封面設計／陳啓文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出版地／中華民國臺北市

初版一刷／一九九七年十月

---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李有成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歐美所, 1997[民 86]

216 面；22.7 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671-539-3 (精裝)

ISBN 957-671-540-7 (平裝)

### 1. 英國文學—評論

873.07

86011496

---

本書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定價／精裝新臺幣 200 元・美金 15 元(含平郵)

平裝新臺幣 150 元・美金 10 元(含平郵)

## 序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第一屆英國文學研討會，議題為「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本論文集即為這次研討會的具體成果。個人忝為研討會承辦人及論文集編者，在論文集付梓之際，謹綴數語，對各方給予的協助表示由衷的謝意：

謝謝許嘉猷所長對研討會及論文集出版的全力支持；

謝謝研討會各場次主持人朱炎、田維新兩位老師及廖炳惠教授的鼎力協助，以及與會學者和同學的熱心參與；

謝謝論文撰稿人及論文審查人在百忙中貢獻心智，使論文集的出版作業能夠依進度完成；

謝謝人文組同仁在不同場合所給予的支持與鼓勵，尤其要謝謝單德興、何文敬和紀元文三位在籌辦研討會及編印論文集期間所提供的各種建議與協助；

謝謝本所行政同仁的配合與支援；

最後還要謝謝助理同仁葉長青、陳雪美、盧德瑤、陳薇萍、徐秀儀、蔡佩庭等的合作與幫忙，使研討會能夠順利舉行，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我尤其要謝謝葉長青在我出國研究期間居中協調、聯絡，並且在電腦輸入、編輯及校對方面竭盡心力，使本書能夠以較佳的面貌問世。

李有成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七日，倫敦

# 目錄

---

|                             |     |     |
|-----------------------------|-----|-----|
| 序                           | 李有成 | vii |
| 緒論                          | 李有成 | 1   |
| 帝國與文化                       | 李有成 | 21  |
| 殖民拼貼畫的裂痕：<br>帝國主義與跨文化「書」入機制 | 羅庭瑤 | 43  |
| 愛爾蘭民族主義兩種版本：<br>葉慈與喬依斯      | 周英雄 | 71  |
| 後殖民批評透視下的十九世紀英國小說           | 陳英輝 | 89  |
| 帝國、第三世界與康拉德的想像視域            | 陳長房 | 119 |
| 帝國、殖民與文本：<br>以《魯濱遜漂流記》為例    | 紀元文 | 161 |
| 撰稿人簡介                       |     | 189 |
| 中英索引                        |     | 191 |
| 英中索引                        |     | 201 |

# 緒 論

李有成



一九九五年冬天，我初次到倫敦大學高思密學院（Goldsmiths' College）的社會學系研究。高思密學院位於倫敦東南區新十字鎮（New Cross），屬路易咸區（Lewisham）。我則寄居在與路易咸相鄰的格林尼治（Greenwich）一個叫迷丘（Maze Hill）的地方。迷丘不大，我住的是一間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式單房公寓，格林尼治公園就在咫尺之間。

倫敦的冬天連倫敦人都抱怨不已，那年的冬天似乎特別令人難受，又風又雨，再加上來自歐陸的寒流，一想到出門就令人心畏。偶而冬陽露臉的週末，如果沒往市中心走，我通常會散步到格林尼治公園去。從我的住處沿特拉法加路（Trafalgar Road）走，約十來分鐘，即是格林尼治公園。到了公園對面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右轉，然後順著公園路（Park Row）朝泰晤士河走，三分鐘左右即到河邊。若攤開地圖來看，這裏其實是個 U 字型的大河灣。迎著寒風面向泰晤士河，我的背後是面貌已經斑駁，但仍然不失其帝國氣勢的皇家海軍學院。學院右邊是來頭不小的特拉法加酒館（Trafalgar Tavern）。酒館建於一八三七年，過去一百六十年間見識過不少風雲人物，當年薩克萊（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狄更斯等都是酒館之常客。皇家海軍學院左側是格林尼治碼頭，碼頭右前方約五十

公尺處有個乾船塢，停放著快速帆船短襪衫號（Cutty Sark）。這艘帆船於一八六九年始航，到一九三八年停役，有六十年之久往返遠東與倫敦之間，為帝國臣民運來中國的茶葉與澳洲的羊毛。碼頭邊有一圓頂建築，下方為河底隧道之入出口，此隧道直通泰晤士河北岸，一九〇二年開始啟用，算算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當年不少住在河南岸的工人要到北岸船塢或碼頭工作，靠的就是這條隧道。隧道至今仍然有其剩餘價值；從格林尼治可利用此隧道到北岸的犬島（Isle of Dogs）或島嶼花園（Island Gardens），然後乘捷運到碼頭區（The Docklands）或倫敦東區。

每次背對皇家海軍學院，看著泰晤士河河上水鳥翱翔，船艇穿梭的情景，我會不期然想像當年大英帝國國威遠播，河上桅竿櫛比，船來船往的盛況。其實不待帝國主義的高峰時期，早在一七三〇年，湯姆森（James Thompson）在其長詩《四季》（*The Seasons*）的〈秋天〉（“Autumn”）一章，就這樣描述他稱之為「眾河之王」的泰晤士河河上活動頻仍的景象：

一片桅竿，像綿延的冬日森林  
豎起尖頂；間中鼓起的帆  
纏住微風的空洞；煤黑的船身  
緩慢行駛；壯偉的駁船  
井然划向和諧；鄰近  
小舟展開雙槳飛翼，輕盈掠過；  
而在水深處，辛勤的聲浪  
從此岸到彼岸，逐漸升高；由橡木撐起的  
不列顛雷霆號，烏黑、英勇  
這怒吼的巨輪衝向大海汪洋。（ll. 124-33）

湯姆森的愛國熱情溢於言表。在他創作《四季》的時候，英國海外殖民已經頗具規模，工業革命也已經箭在弦上，對外貿易正在

急速發展，而倫敦港幾乎主宰了三分之二以上帝國的進出口貿易，泰晤士河河上的繁忙景象其實不難想像。大英帝國大業因商業利益的需要仍在不斷擴展當中。

大約一百七十年後，在帝國的顛峰時期，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描述泰晤士河河上的活動時，我們所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種場面：

入暮以後，河面寬闊的老河流波面平靜，多少世代以來，這條河為居於兩岸的民族鞠躬盡瘁，以寧靜的尊嚴流向世界盡頭。……潮起潮落，永不間歇，充滿了多少人與船的記憶，這條河帶著這些人與船，或回返家園靜養，或往海上戰鬥。這條河熟知多少令這個國家引以為傲的人，為他們服務過，從德列克爵士到弗朗克林爵士，不論曾否受到冊封，這些人都是騎士——都是偉大的海上遊俠。這條河負載過所有名字像珠寶般在時間的黑夜中閃亮的船隻，從金鹿號到幽冥號和恐怖號。金鹿號因滿載財寶歸來而受到女皇巡幸，其偉大故事因而傳頌一時；幽冥號與恐怖號則因征途殊異而未再返航。這條河熟知那些船隻與船員。他們從鐵特福德（Deptford），從格林尼治，從伊利斯（Erith）出航——這些探險家和殖民者；皇室的船艇以及商賈的貨船；船長、海軍將領、東方貿易的黑市商旅，以及東印度公司艦隊的商客。這些爭名逐利的人，全都從這條河流出去，揮著長劍，不時也揮著火把，他們都是展現這塊土地力量的使者，也是從聖火中帶來火把的人，還有什麼壯舉不曾在這條河上浮沉，航向地球未知的神秘！……人們的夢想，大同世界的種子，帝國的胚芽。（Conrad 16-17）<sup>①</sup>

<sup>①</sup>德列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1545-96）於一五七七年乘金鹿號（the Golden

康拉德所描述的顯然不是一條普通的河流，也不是一條河流的平凡生命：他筆下的泰晤士河是帝國命運之所繫，多少對外擴張由此開始，多少殖民經濟的利益靠這條河流維護。「多少世代以來，這條河為居於兩岸的民族鞠躬盡瘁」。如今帝國的光芒早已不再，大不列顛內部甚至還為自身主權的問題與歐洲聯盟爭吵不休，即使今天，只要在泰晤士河兩岸隨便走走，舊帝國的過去仍然隨處可見。

## 二

從皇家海軍學院正門越過與特拉法加路接連的隆姆尼路（Romney Road），順著國家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旁的威廉王路（King William Walk）走，很快就進入格林尼治公園。雖然是冬天，草地卻仍然油綠一片，並不因季節的變化而乾枯。公園有小徑若干，迤邐爬上山丘，就是舊皇家天文臺（Old Royal Observatory）：世界標準時間由此開始，地球的子午線也是由此開始。楊格（Robert J.C. Young）曾經這樣描述舊皇家天文臺可能帶給人的方位感：

循著牆壁走，你來到置於地面的銅條。這鑲嵌在地面的平滑金色條帶標示著子午線或零度經線。你在這座小山丘上發現自己正身處世界的零度、時間的中心。矛盾的是，要讓格林尼治成為時間的世界中心，就必須以方位的他性將之銘刻。站在銅條的左手邊，你就身在西半

---

Hind）穿越麥哲倫海峽（Straits of Magellan）進入南海，是第一位環繞地球一周的人。弗朗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 1786-1847）最早在澳洲沿海探險。自一八一九年開始即在尋找進入太平洋的南北航道，一八四五年初嘗宿願。幽冥號（the Erebus）和恐怖號（the Terror）皆為此次探險之艦隊船隻，不幸為冰雪所困，船員在飢寒與疾病交迫之下全部罹難。

球。若向右小移一碼，你就進入東方：不管你是誰，你就會從歐洲人變成東方人。回頭將一隻腳向銅條左移，你就會與異己性游移混雜：你同時既是西方人，又是東方人。(Young 1)

楊格的興趣在於屬性或身分的混雜性，特別是帝國都會倫敦的異質屬性：倫敦之能夠「把遙遠的邊陲吸納到中心來」(Young 2)，顯然是大英帝國數世紀以來海外殖民的結果。即使在格林尼治鎮上，不僅帝國主義遺跡處處可見，後殖民的現在——海外殖民的結果——也是所見多是：鎮上有香港人經營的「大碗麵」中國餐廳、南亞移民的便利商店、紀念品店、報紙雜誌代理商店；小吃廣場更不乏東南亞食物、印度咖哩和烤餅等；而在週末市場中，更有印度小牛皮皮包、非洲工藝品和服飾、加勒比海的黑人音樂等等。這些看似屬於異國情調的成分，如今不僅與倫敦的生活密不可分，其實早已成為倫敦在地景觀的一部分。薩依德(Edward W. Said)在討論文化的混雜或異質性時，即曾一針見血指出這種現象：

文化並非一元、單一或自主的東西，其實文化所僭取的「外來」成分、他性、差異，要比文化有意排除的要來得多。今天在印度或阿爾及利亞，有誰能信心十足地從現況中分割出英國或法國的過去成分？而在英國或法國，又有誰能夠為英國人的倫敦或法國人的巴黎清楚劃上圈圈，並將印度與阿爾及利亞對這兩個帝國都會的影響排除在外？(Said 15)

大英帝國之所以能夠稱霸海上，其實與格林尼治的舊皇家天文臺密切相關。對西歐若干殖民帝國而言，十七、十八世紀的大事之一即是解決經線的問題。緯線的問題不難解決，只要以赤道

爲中線，不論南北，與赤道平行並逐漸向南北兩極收縮的圈線都是緯線。經線的問題可不那麼簡單。在解決經線的問題之前，在浩瀚大海中航行，只能仰賴星宿或天象判斷航線或船隻的位置。船難頻頻發生顯然與此有關。十七世紀著名的日記作家畢比斯 (Samuel Pepys) 即曾這樣記述航程中船員對航線莫衷一是的混亂情形：

最明顯的是，要如何判斷，判斷時的荒謬爭執，以及因爭執而身陷混亂失序，……從這些人所面對的亂七八糟情形看來，恐怕只有萬能上帝的恩慈或者因爲命大，海上航行才僥倖沒有那麼多災難和不幸發生。(引自 Sobel 16)

一七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由索弗爾爵士 (Sir Cloudisley Shovell) 所率領的英國海軍在直布羅陀擊敗法國地中海艦隊之後，返航途中因判斷錯誤而在英國附近的西里群島 (Scilly Isles) 觸礁遇難，除索弗爾爵士及其一名手下外，五艘戰艦上約兩千名水兵全部罹難。此事震驚英國朝野，解決經線的問題已經是迫在眉睫。一七一四年英國國會通過經線法案 (Longitude Act of 1714)，懸賞獎金高達兩萬英鎊——當初皇家天文臺的建築費只花了五百二十英鎊九先令一便士——，尋訪解決經線問題的答案。<sup>②</sup> 其實早在一六七五年，英王查爾斯二世 (Charles II, 1630-85) 就命令著名的建築師任恩爵士 (Sir 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 建造天文臺。依當時的理論，天象應該是解決經線問題的根本依據。皇家天文臺奠基於一六七五年八月十日下午三時

---

②英國國會之所以立法懸賞巨額獎金，而未直接委託任何人或機構解決經線的問題，原因在於當時相關的技術還不是那麼發達。而某些致力於研究經線問題的人也一時提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Sorrenson 265)。

十四分——這是首任天文臺臺長費蘭姆斯狄德（John Flamsteed, 1646-1719）親自選定的吉日良辰，第二年七月十日，未到而立之年的費蘭姆斯狄德開始進駐，從此展開他長達四十三年的觀星歲月（Forbes 21-23）。今天的舊皇家天文臺因此又被稱為費蘭姆斯狄德之屋（Flamsteed House）。查爾斯二世在詔書中清楚指示費蘭姆斯狄德的主要任務：「務以細心勤奮修正天體運行圖及星宿位置圖，尋覓眾所欲求之海上經線，俾使航海之術臻至完善」（引自 Sobel 31）。費蘭姆斯狄德長年觀察天象，生活單純，不事人際關係；但他治事嚴謹，不肯輕易發表其觀察記錄，因而與當時的科學泰斗牛頓、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就是發現哈雷彗星的那位天文學家——等時生齟齬。哈雷後來在費蘭姆斯狄德逝世後繼任天文臺臺長。設立皇家天文臺的理論其實非常簡單：天文學只是手段，解決經線的問題才是目的。

今天的舊皇家天文臺仍然保存著費蘭姆斯狄德當年的簡單起居設備。除此之外，天文臺最引人注目的收藏當是四個分別以 H1、H2、H3、H4 命名的計時器。這些計時器至今依然維護良好，是天文臺的鎮臺之寶；而經線問題的解決，靠的就是這四個計時器，與天文知識似乎反倒關係不大。換言之，解決經線問題的並不是天文學家，而是不識天文的鐘錶匠。這段公案始末，曾任《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科技記者的蘇貝兒（Dava Sobel）在其新著《經線》（*Longitude*）一書中有相當感人的敘述，箇中曲折滄桑，讀來令人心酸。

這位鐘錶匠名叫哈利森（John Harrison, 1693-1776）。經過四年的精心研究，哈利森相信自己構思中的計時器可以解決經線的問題。於是他帶著設計說明從自己居住的林肯郡（Lincolnshire）到格林尼治，登門拜訪時任皇家天文臺臺長的哈雷。哈雷熱誠相待，並引介他認識當時著名的鐘錶匠葛拉翰姆（George Graham, 1673-1751）。葛拉翰姆對哈利森的計畫極感興趣，甚至主動借貸供他進行研發。哈利森一號計時器（H1）花了六年的時間始告完

成。經葛拉翰姆的熱心安排，在皇家協會（Royal Society）公開展示，深受行家肯定。更重要的是，經過海上航行測試之後，H1的精確穩定完全合乎要求。不過哈利森並不滿意，他認為還有改善之處，只向主持經線獎金的經線委員會（The Board of Longitude）預支了兩百五十英鎊，希望能儘早完成哈利森二號（H2）。

哈利森於一七四一年元月將 H2 呈交經線委員會，皇家協會一七四一年至一七四二年的報告中對 H2 語多讚賞。哈利森仍不滿意，隨即著手鑄造哈利森三號（H3）。此時哈利森已四十八歲，並且已移居倫敦。此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哈利森埋頭研製 H3——哈利森工作勤奮，至今仍沒有人瞭解他何以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來完成 H3。哈利森對 H3 仍不滿意，於是再接再勵，於一七五九年完成後來被暱稱為「錶」（The Watch）的哈利森四號（H4）。這個計時器終於為他贏取了經線獎金，只不過這是他孤軍奮鬥、力抗經線委員會與皇家協會若干當權科學家的刁難與迫害之後才獲得的結果。當權派中最厲害的代表人物是擔任第五任皇家天文臺臺長的馬斯克林（Nevil Maskelyne, 1732-1811）。其實這裡面存在著兩條路線的利益鬥爭。馬斯克林出身劍橋大學，受過良好教育，壓根兒就瞧不起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哈利森。此外，他代表的是另一派相信利用月亮的距離即可測出經線位置的科學家。如果哈利森的 H4 獲獎，他就要前功盡棄，利益頓成泡影。因此他利用自己職權上的方便，對哈利森百般阻撓與打擊。哈利森逼不得已，只好向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求援。此時哈利森又完成了 H5，他呈請喬治三世測試，喬治三世測試後對 H5 頗多讚譽。經線委員會於是在一七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召開會議，聽取哈利森的申訴；三天後國會針對哈利森的案子公開辯論，以還哈利森公道。哈利森終於在七除八扣之餘，獲得獎金八千七百五十英鎊。此時距他完成 H4 已快十五年，而距 H1 的面世也已近四十年矣！三年後，哈利森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去世。

H4的好處不只是精確，而且易於複製。經過改進並大量生產

之後，計時器已成為每一位船長必備的工具。海上航行的危險遂告減少，大英帝國的船艦更是縱橫海上。蘇貝兒因此指出：

誠然，若干現代鐘錶學者認為，哈利森的產品幫助英國主宰四海，也因此締造了大英帝國——就因為憑著計時器，不列顛才會成就海上霸業。(Sobel 152-53)

一八八四年十月，世界二十五國的四十一個代表團在華盛頓召開國際子午線會議，會中確立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也確立了經線零度應由格林尼治開始。這一切大概不是一百多年前哈利森設計其計時器時可以想像的。

### 三

計時器的發明以及經線問題的解決為航海技術帶來新的契機，在完成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締造帝國大業上貢獻良多，皇家天文臺像大英博物館及庫幽花園（Kew Gardens）等公共空間那樣，成為朱金（Sharon Zukin）所謂的權勢地標（18）。不同的是，皇家天文臺佔地不大，房舍簡樸，不像若干權勢地標那樣，或巍峨聳立，或空間廣大；皇家天文臺之權勢顯然來自其歷史功能，來自其左右世界、統領四方的「中心」地位。

「中心」一詞係取自法國社會學者拉杜（Bruno Latour）的科學研究的科學理論：一個足以引發哥白尼式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的公共空間或建制（224）。我之所以較有系統地閱讀拉杜其實與閱讀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傅柯曾經自承，他研究監獄史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囚禁的措施」，因此他的興趣主要在於方法，在於「如何」，而非「什麼」。甚至在研究所謂瘋狂的現象時，他的本意也是在解決「如何」的問題，也就是在於他所說的「道德技術」（“moral technologies”）的問題：如何囚禁？

如何懲戒？或者如何區隔瘋狂與理性？（Foucault, “Questions” 74）宏觀而論，這些問題其實最後都可以歸納到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問題，其答案在於方法，在於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大辭典》（*Encyclopedia*）中所謂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也就是將經濟學帶進政治實踐中：

治理國家……意味著應用經濟學，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設置一個經濟體系，也就是將之運用在國民及其財富與行為上面，這是一種監視與控制形式，其專注猶如一家之主對其家眷與家財的監視與控制。（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92）

殖民統治更是一種赤裸裸的「監視與控制形式」，只是在實質上這種監控形式往往來自遙遠帝國都會的「中心」，是所謂遙控或遠距離控制（long-distance control）的形式之一。由於擔心「鞭長莫及」，同時顧忌到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殖民統治所仰賴的監控形式無疑更為細膩，更為不著痕跡。

拉杜並未特別關注殖民統治的問題，只是在研究科學知識的累積與生產時，他也討論到類似的現象。他稱之為遠距離行動：「中心」如何對遙遠的邊陲發揮影響力。在《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一書中，拉杜提到這麼一個例子。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七日清晨，法國星盤號（L'Astrolabe）的船長拉佩路斯（Lapérouse）在東太平洋某個叫庫頁島（Sakhalin）的地方靠岸。拉佩路斯並不清楚庫頁島究竟是個半島或者是座島嶼。有些地圖顯示這是個半島，可是在某些地圖上庫頁島又是座島嶼。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拉佩路斯的船上已有性能不錯的計時器，可以更精確地測量經線的位置。拉佩路斯在海岸上遇到幾位「野蠻人」——其實他們都是中國人：

他們……似乎非常確定庫頁島是座島嶼。……一位年紀較長的中國人在沙灘上約略描了一下「滿洲」（“Mantchèoux”）——即中國——這個國家，以及他的島嶼；然後他指手畫腳地說明分割二者之間的海峽大小。地圖的大小比例並不明確，不過眼看漲潮很快就要沖掉先前「沙灘上」的地圖了，一位年紀較輕的中國人於是抓起拉佩路斯的筆記本和鉛筆，另外畫了一張地圖，並以小記號標明地圖的比例，每一個小記號代表獨木舟一天的行程。……數月之後，他們終於來到堪察加（Kamchatka），但並未發現什麼海峽，他們惟有依賴那些中國人的說法，判定庫頁島確實是座島嶼。（216）

拉佩路斯於是命人兼程從陸路將相關地圖、筆記及海上航行兩年期間所記錄的星象資料送往巴黎凡爾賽宮——拉杜所謂的「中心」。在這些筆記資料中，有一項有關庫頁島的記載，顯示「庫頁島的問題已經解決」，同時還記錄了「海峽可能的方位」（216）。

我們可以借用庫頁島的例子來說明拉杜的大差距（Great Divide）理論。庫頁島上的中國人「相信」庫頁島是座島嶼，相對於這些中國人而言，拉佩路斯對庫頁島的認識實在有限。此時在雙方的大差距中，中國人顯然佔了上風，拉佩路斯則遠遠被比了下去。在拉佩路斯將其記錄和資料送回到凡爾賽宮之後，有關庫頁島的一切頓時成為儲存於「中心」的「知識」。這樣周而復始，經過幾次航行與探險，有關庫頁島的知識越積越多，於是原先大差距圖中的雙方開始主客易位；後來的航海者或探險家在累積了不少有關庫頁島的知識之後，顯然要比只能依賴自己信念與經驗的中國人較佔優勢。拉杜因此指出：

當地人晦暗的地理經地理學處理後變為明晰；野蠻人的在地知識變成了地圖製作者的普遍知識；在地人模糊不

清、不甚精確與毫無根據的**信念**被轉換為精確、可靠與合理的**知識**。對於與大差距有關之各方而言，從民族地理學到地理學，似乎就像從童年走向成長，從激情走向理性，從野蠻走向文明，或者從一級直覺走向二級內省那樣。(216)

這個現象正是拉杜所說的科學或知識的累積性：如何從遠方將各項資料或記錄帶回到某個地方分類儲存，讓其他人也能夠瞭解和熟悉遙遠的人、事、物。此外，知識的累積必須借助某些建制或公共空間：天文臺、博物館、圖書館、植物園、實驗室、學術性學會或專業團體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建制或公共空間所形成的眾多「中心」被部署為網路組織，因而能夠在「遠距離行動」(Latour 232)。用後殖民論述的術語來說，這豈非中心對邊陲的遙控？豈非帝國都會對被殖民者的遠距離宰制？

拉杜的理論與殖民或後殖民論述並無直接關係，不過對我們而言，大差距現象所形成的層系關係卻也使他的理論饒富啟發性；甚至拉杜也在有意無意中以相當後殖民的語氣指出：「在中心從事活動，有時候使得在時空上宰制邊陲變成可能」(232)。③

#### 四

少年時代讀地理，有時候看著世界地圖上的大不列顛，再怎麼看都稱不上是個大國；像這麼一個幅員不算大，又遠遠孤懸於

③約翰羅 (John Law) 在研究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航海術時指出，要確保中心能夠順利控制邊陲地區，至少要有三個條件：一、文獻，包括地圖、圖表、星宿圖等所有「書寫或印刷的文字」(251)。二、儀器，諸如星盤、四分儀、六分儀等。三、人員，包括水手、航海家等，這些人必須擁有豐富的航海知識與經驗，絕對不能犯錯。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而且不論文獻、儀器或人員，都必須便於移動或行動，同時強韌耐久 (251-54)。